

江夏李氏叙略

刘 涛

魏晋时期，李氏是江夏郡的著姓望族。江夏郡设于西汉高祖六年（前201），地跨今湖北、河南二省，淮水穿其北境，中有云梦泽之饶，江、汉二水在境内交汇。因为“沔水自江别至南郡华容为夏水，过郡入江，故曰江春。”^①

李氏在江夏的居住地点，西汉时在郡境北部的钟武（治今河南省信阳市东南），东汉时改钟武为平春（治今河南省信阳市西北，位于淮水上游弯道的西南岸，是东汉新设的侯国）^②。三国以后至于唐朝，因朝代的频繁更迭和行政区划的多变，平春（钟武）的归属也不断发生变化：两晋时先后属义阳国、义阳郡；南朝齐、梁时属北义阳郡；南北朝后期，为北齐义阳郡统属，隋朝仍旧；唐朝属申州。江夏李氏于西晋末年迁离故土南下江左之后，依然称郡江夏，以见门户所在。

江夏李氏于魏晋的士族阶层，恐怕要归入东汉以来渐渐形成门户的旧门楣一类。与东晋显赫的一流士族庾氏来比较，曹魏时庾乘所任不过襄城令，而李通拜将封侯，官至汝南太守。且李通五世祖李就在东汉中期业已守郡封侯。李氏门户虽旧，有家世簿阅可恃，但是在士族政治极盛的东晋时期，李氏宗族势力并不强盛，不是王谢庾褚那一类与皇室王权联系得十分紧密、当轴主政的显族。对于李氏著名人物的表现而言，他们对政治更多地处于消极的态势，不曾参与高层的权力之争，尽管可以说他们是没有

客观的机缘参加门阀政治的运作，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所思所行更多地保持着家族“经明行修”的门风，以学术文艺显示门户清贵的倾向。因为学术文化与政治地位、经济实力一样，也是供给个人获取声望，供给家族维系门户的一种能量。

本文意在通过钩索沉隐，还原江夏李氏的谱系、迁徙的来龙去脉及其文化面貌，虽属拾遗补阙，或可反映这一家族自东汉以迄唐朝的概貌。

一、江夏李氏的人物谱系

有关江夏李氏的史料，极其零散。正史中立传者仅三人：李通见于《三国志·魏书》，李重、李充见载《晋书》。另于《世说新语》、《法书要录》的有关篇章中散见零星的记载。至于江夏李氏谱，《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有赵郡李氏江夏一房西汉至唐朝的世系，但疏漏不全，错讹甚多。宋朝汪藻《叙录》集有魏晋士族谱，江夏李氏阙如，仅于所附“无谱者二十六族”载：

“李膺字元礼。李重字茂曾，平阳太守，从子充，字弘度。”本世纪新发现的文物中有两件涉及江夏李氏，即现存河南省新安县铁门《千唐志斋》的《唐故北海郡守赠秘书监江夏李公墓志铭并序》，和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的敦煌石窟所出唐德宗时写本《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

我们考察江夏李氏的具体资料大抵如此。这里试加勘校纂辑，将汉晋时期江夏李氏世系及具体人物简述如次。

唐朝《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英藏敦煌写卷，编号斯二零五二）记载：“江夏郡出七姓：李、黄、程、费、任、衙、喻。”虽然李氏是江夏的望族，但李氏不是荆楚土著旧姓，而是赵郡李氏分出的一支。《新唐书》卷七二上《宰相世系表》：“赵郡李氏定著六房，其一曰南祖，二曰东祖，三曰西祖，四曰辽东，五曰江夏，六曰汉中。”

据该表又得知，赵郡李氏定居江夏郡的第一代人是李就，“江夏李氏：汉酒泉太守护次子昭，昭少子就，后汉会稽太守、高阳侯，徙居江夏平春。”李就以下，李充以上的江夏李氏世系，《宰相世系表》不载，而且李充以下的世系出现颠倒误置。借助表中所列李就兄李脩一脉的世系，参照《三国志·李通传》、《晋书》中的李重、李充二传，可知李通是李就的五世孙，李通生绪、基。绪生秉（玄胄）。秉生重、尚、嶷、矩。重生式、定、慕、廐；矩生充。充生颢；慕生志。江夏李氏在魏晋时期的世系基本如此。

李就，^③祖护，字鸿默，西汉酒泉郡太守，护三子：武、昭、奋。父武，字昭先，东郡太守、太常卿。李就官东汉会稽太守，封高阳侯，徙居江夏平春。

李通（178—219）^④，字文达，小字亿万。年轻时“以侠闻于江、汝之间”，建安初年率众往许昌投奔曹操，征讨张绣有功，封建功侯。官渡之战，拒袁绍拜将、刘表招纳，助曹操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建安二十四年（219）蜀将关羽围曹仁于江陵，李通入围营救，勇冠诸将。道途染病而亡，时年四十二。二子：绪、基。

李绪，魏平虏中郎将，曾驻屯樊城，有战功。弟基，袭父爵，为魏平虏中郎将。^⑤

李秉，字玄胄。父绪。西晋时官秦州刺史，封都亭定侯。有俊才，为时所贵。^⑥子：重。

李重（253—300），字茂曾。“早孤，与群弟居，以友爱著称。”少好学，有文辞。“弱冠为本国中正，逊让不行”，咸宁三年（277）为始平王司马裕文学，旋迁太子舍人，转尚书郎。武帝太熙初年迁吏部郎，”不通私谒，特留心隐逸，由是群才毕举，拔用北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吉谋等为秘书郎及诸王文学，故海内莫不归心。”后出守平阳郡，“崇德化，修学

校，表独行，拔贤能，清简无欲，正身率下。”李重“以清尚见称”，为“中夏名士，于时以比王夷甫。”^⑦其弟李嶷亡，去官。永康元年（300）赵王伦为相，辟李重为相国左司马，忧逼成疾，不治就死，时年四十八。^⑧有三弟：尚、嶷、矩，嶷早亡。五子，式、定、慕、廕知名于世。

李尚，字茂仲。永嘉年间（307—312）典郡。

李矩，字茂约。永嘉年间典郡，官江州刺史。^⑨

李式（275—328），字景则。李重长子。渡江后累迁临海太守，侍中。东晋咸和三年卒，年五十四。^⑩

李定，以工书法知名于世。^⑪

李慕，官绥阳令。^⑫子：志。

李廕，字宗子。李重第五子。“清贞有远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臂疾不能行坐，常仰卧，弹琴、诵读不辍。”因有高名，河间王征为太尉掾，托言有疾不赴任。随长兄李式南迁后，“司徒王导复辟之”。两次被公府征辟，故号“李公府”。永和年间（345—356）卒，居兄式墓下。李式卒后葬临海。^⑬

李充，字弘度。父矩，母卫铄（即卫夫人）。少孤，“其父墓中柏树尝为盗贼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颇具其祖李通豪侠猛悍的遗风。东晋咸康四、五年间（338—339）“辟丞相王导掾，转记室参军。”约在永和二年（346）为褚裒征北将军府参军，以家贫求外任，永和四年除会稽郡剡县令。^⑭永和五年遭母忧守制。服阕，为大著作郎，累迁中书侍郎，卒于官。子：颢。

李恪，唐《李邕墓志》载：“公讳邕，字太和，本赵人也。烈祖恪随晋南迁，食邑于江数百年矣。”据此，当与李式同辈。《宰相世系表》未录李恪，墓志所记或可补正史阙佚。

李颢，有文义，郡举孝廉，颇有著述。《李充传》附记。

李志，字温祖。“仕至员外常侍、南康相。”^⑮

降及南朝，江夏李氏子孙几乎不闻于世，延绵到唐朝，李善

才以注《昭明文选》显迹，却还“显而不荣”。其子李邕“才杰艺能”，又获得出守一方的显位，李氏又声名卓著。出自李善弟李昉一脉的李廌、李璣在晚唐登相位，但掌权的时间都很短暂。江夏李氏人物，显者大体如此。

二、赵郡李氏析支江夏的年代及播迁江左之后侨居地的推断

李氏“徙居江夏平春”的时间只知道在“后汉”，具体在哪一朝则无记载。我们知道李就五世孙李通生当灵帝光和元年（178），按五世推算，同时考虑到李就的徙居析支应当在他出守会稽郡、封高阳侯之后，那么他徙居江夏平春大约在安帝朝（107—125）。安帝朝，其兄李脩于永初五年（111）正月以光禄勋进位太尉，元初元年（114）九月罢免。李脩的太尉之任恐是李就守郡封侯的前因之一，而李脩被罢官或许又是李就徙居江夏平春的背景。

由《宰相世系表》所示赵郡李氏六房之祖的职官知道，南祖、东祖、西祖的立房要晚至西晋，而江夏、汉中、辽东三房则早在东汉。江夏李氏的一世祖李就当初徙居平春是否迁自赵郡呢？《后汉书·孝安帝纪》注引《汉官仪》载李就兄李脩的本贯为“豫州襄城。”^⑥按两汉时襄城属颍川郡。而赵郡李氏析支颍川，《宰相世系表》记载：“（李）秉字世范，颍川太守，因徙家焉。”李秉（世范）可能是赵郡李氏移居颍川襄城的第一代，他是李脩、李就的七世祖。李脩孙李膺那一辈，李氏仍居襄城，《后汉书》卷六七《李膺传》载：“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也。祖父脩，安帝时为太尉，父益，赵国相。膺性简亢，无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陈寔为师友。”《广韵》记李氏出十二望，其中的襄城李氏估计就是指的李秉（世范）至李膺这一宗族。

由此可知，李就徙居江夏平春之前的居地是颍川襄城，即是从颍川襄城南迁到江夏平春的，江夏李氏是由襄城李氏派生的支

脉。

但是，目前所见氏族谱所载郡望，都未著录颍川李氏，^{①⑦}原因其实很简单，检阅《后汉书·李膺传》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便可知晓，居颍川襄城的李氏在李膺下狱拷死之后，其子瓚逢东汉末年的乱世，为了避难，便由襄城迁回先祖故地赵郡。西晋末年，又“避赵王伦之难”，迁移到平棘南（今河北省赵县南），“号平棘李氏”。李氏居于颍川襄城历十世，当东汉时期，门户虽无汝南袁氏四世三公那般显赫，但数世典郡，李膺官至太尉，李膺名满天下，也是名门世家。而襄城李氏不以颍川郡望闻世，重要的原因是东汉末已迁离颍川，迁到平棘后便以“平棘李氏”著称了，而且赵郡李氏六房中的南祖、东祖、西祖三房，通号平棘李氏。^{①⑧}

颍川襄城李氏自西晋以后便消声匿迹了。然而，其门第的声望及其影响力在东汉时期远远超出其宗族支脉的江夏李氏，江夏李氏于李就至李通之间的谱系不详于史籍，就是一个佐证。前面说到，江夏李氏有家世簿阅可恃，不是庾褚那类乘时而起的新门户，因为我们知道李通是“举众诣太祖（曹操）于许”的。李通的部众包括兼并周直的宗部二千余家，郡人陈恭的部众，还有生擒黄巾大帅吴霸后收纳的降属。李通之所以能兼并招纳，在于他有一支由家兵部曲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三国志·李通传》中就记有李通在拒绝袁绍结纳时，其“亲戚部曲”劝他接受征拜的情节。李氏成为江夏的豪族强宗，当然有李就守郡封侯的家世背景在，而李就的家世背景又紧密地联系着其兄李膺为继嗣的本支颍川襄城李氏。尽管襄城李氏后来不称于载籍，但我们却不能忽略这一宗族在东汉卓著的社会声望对于分支未远的江夏李氏形成门户势力曾经有过的作用。

从颍川襄城李氏分支的李就一族，居江夏郡自东汉安帝时期以迄西晋末年，历九世。司马睿渡江南迁，李氏也随侨流播迁江

。左南迁之后江夏李氏侨寓之地，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也不是了无踪迹可寻。《世说新语》棲逸第十八“李廌是茂曾第五子”条记李廌“居在临海（今浙江省临海）”，其兄李式生前守郡临海，卒后葬于该地。又《晋书》记李充曾任会稽郡治下的剡县令，并“筑室东土”。会稽、临海两郡都位于浙东，同属扬州统辖。需要注意的是，李充出仕之初为丞相王导的记室参军，当居建康；后为征北将军府参军时，似在江北的兖州；李充向褚裒提出到地方上任职的要求，虽然说过“穷猿投林，岂暇择木！”但他终究没有安置到褚氏治下的属县，也不投他方，却转到殷浩治下的剡县任职。李充的主动脱离军府，必定得到褚裒的体谅，他出自士族，又负高名，褚氏不会为难他。而最终出任剡县，不会出于褚氏的主意，更有可能是李充的意图，且有殷浩从中援手的迹象。他的选择剡县，我认为与江夏李氏聚居浙东地区大有关联。东晋高门盛族的王谢等家族子弟，当时也都选择浙东一带作为侨居之地，并且在这一地区求田问舍行田营利以安其身。

在动荡不定的南朝时期，江夏李氏侨居地估计仍然在地僻而相对安定的浙东地区。唐朝初年，李元哲“徙居广陵”。^⑩其孙李邕，《旧唐书》也称其籍贯为“广陵江都”，可知李氏一支又由浙东迁到江北的广陵郡江都。但李昂撰写的李邕墓志中竟不提“广陵江都”，只言李氏“本赵人”，并且不忘在志题中标示“江夏李公”，意在表明李氏乃江夏郡望，以李氏家族门第的悠远来显示门户的尊贵。

综上所述，赵郡李氏的一支定著江夏，经过两次迁移。这两次迁徙的背景大体相同。西汉李秉（世范）是出任“颍川太守，因徙家焉。”东汉李就是出守会稽郡之后“徙居江夏平春。”都属于宗族分支别居他地的正常迁徙，并且呈现出南迁的方向性和递迁的轨迹。东汉末年以及西晋末年的社会动乱，造成了我国历史上人口大迁徙浪潮，这时赵郡李氏递相南迁的两支，又面临新

的迁徙，而迁徙的路线则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方向性。汉末时颍川襄城李氏是回归先祖故地赵郡，后来又一度北迁毗邻的常山郡。江夏一支因为李通组织起武装力量自保，又有汝南郡的守土之责，没有迁徙之举。但终于在西晋末年随司马氏政权的南迁而迁徙到相对安定的浙东一带，直到唐朝初年社会恢复正常秩序之后，才由偏僻的浙东北迁到长江北岸交通要道的广陵江都。

由此看来，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下，迁徙常常与宗族的分房自立门户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一旦社会陷于严重无序旷日持久的动荡之中，家族的迁徙势在必行，首要考虑的是躲避战乱，选择目的地的重要条件是局部的安全和安定，能衣食自保，而不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带和兵家必争的通衢重镇所在。何去何从，当然也要视宗族当时所处的具体状态和政治态度而定。

三、江夏李氏的文化面貌

在史家笔下，江夏李氏人物有多种类型：李通的侠义骁勇，颇有燕赵义士慷慨赴死的古风；李重的不附乱臣贼子，忧逼成疾不治而就死，直如楚国屈原自沉殉国的悲壮；李廌两次不应公府的征辟，甘于居家弹琴诵书，胜似汉魏的高士隐逸。这样的侠勇、忠义和独善其身，都是一种文化行为，反映出两汉以来儒家的文化精神，也可以视为李氏家族的门风。西晋以降，特别是南迁之后，尽管李氏不乏守郡之臣，却已势单力薄。经济上更处于颓势，李通生前死后所得封邑六百户，在西晋永康元年李重逝世之际，竟至于“家贫，宅宇狭小，无殡敛之地，诏于典客署营葬”的窘迫之状。李充在征北将军府“苦求外出”的主要原因也是“家贫”。对于江夏李氏来说，保持士族门第及清贵的社会声望，其凭藉不再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三位一体，而侧重文化条件，主要表现为学术的著述和文艺的修养。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江夏李氏的文化面貌。

魏晋学术的主流，已经由汉代的独尊儒术转向了崇尚老庄，即由经学过渡到玄学，探求哲理的清谈，便成为一时的风尚。从学术的角度而言，清谈是一种学术行为，一种学术交流的重要形式。两晋时期的学术名流，大抵是由清谈而显贵的名士。西晋时，王弼、何晏是清谈的胜流，及至东晋，玄风不衰，李充是代表人物之一，《世说新语》文学第四“简文称许掾”条注引《续晋阳秋》载：“正始中（240—248），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江左李充尤盛。”李充的诗文，也颇得老庄之旨，如“来若迅风欢，逝如旧云征。离合理之常，聚散安足惊。”^{②①}李充好道家之言，非唯玄风熏染所致，就宗教背景而言，江夏李氏与山东琅邪王氏、高平郗氏等士族一样，也是信奉道教的世家。^{②①}

清谈固然可以促进玄学的发展，博取声名，但是，对于礼玄双修儒道兼综的衣冠旧族来说，文章著述才是不朽的盛业。所以，即使是出身高门的王羲之，尽管他以书法闻名天下，当他听说有人把他撰写的《兰亭集序》比作西晋文学家潘岳的《金谷诗序》，便大为欣喜。在魏晋士族阶层，象卫氏、王氏那样四世三世擅长书法的家族不算稀奇，如江夏李氏雅好著述四世不衰，却特别少见。李氏一门的表章诗赋，《全晋文》卷五三有辑录，那是散佚之后拾掇的残篇断章。其著述的概况，《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有比较全面的反映，这里参照《三国志·李通传》裴注及《晋书·李充传》的相关记载加以补充，综录如次：

- 《家诫》 李秉撰（见《三国志》裴注、《全晋文》）
- 《散骑常侍李重集》二卷
- 《论语》十卷 李充注
- 《翰林论》三卷 李充撰（梁朝著录五十四卷）
- 《论语释》一卷 李充撰（《唐志》未录）

李充《释庄子》二卷（《隋志》未录，见《唐志》。
《晋书·李充传》名曰“《释庄
论》上下二篇”）

李充《尚书注》（见《晋书·李充传》）

李充《周易旨》六篇（见《晋书·李充传》）

《李充集》二十二卷^②（梁朝著录十五卷，《唐志》
作十四卷）

《集解尚书》十一卷 李颙注（《唐志》作十卷）

《尚书新释》二卷 李颙撰（《唐志》未录）

李善注《文选》六十卷

李善《文选辨惑》十卷

《李邕集》七十卷

李邕《狄仁杰传》三卷

其中，以李充的学术博涉多门。他于学术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贡献，东晋时典籍混乱，他出任大著作郎之后，“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同是东晋清谈骁将的殷浩、王述等辈，著述远不如李充宏富。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以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对于士大夫来说，这是获取不朽功名的辛秘。对于衣冠旧族的江夏李氏来说，当失去了昔日庄园经济的支持，又丧失政治权势的凭籍之后，欲象王谢家族那样保持门户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家族的文化优势来维系了。南北朝后期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说：“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读书尚且如此，著述更不在话下了。

“依倚道艺”是东汉时期世家的门风，魏晋时期，艺事中最受士族看重者是书法。中国书法的历史很悠久，它被当作艺术来

操作，当作审美对象来欣赏却是魏晋之世的事情。书法，不管是作为艺术的表达还是实用的书写，其实践都是个体性的，由此获得的社会声望首先也是个人的。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时期的知名书家，大都具有书法世家的背景，如京兆杜氏（杜预）、颍川钟氏（钟繇）、安邑卫氏（卫瓘）、高平郗氏（郗愔）、泰山羊氏（羊忱）、颍川庾氏（庾翼）、陈郡谢氏（谢安）、太原王氏（王濛）、谯国桓氏（桓温），都是几代善书，琅邪王氏（王羲之）的世代善书，更为久远。书法在这一时期不仅是作为艺术被热爱，而且被视为个人风度的象征和士族门第的标志。江夏李氏在书法方面不乏杰出的人物，李重有子五人，李式、李定、李廞兄弟都称誉当世，李式的名望尤高。^{②③}李式在书法上树立名望之际，王羲之正值青年时代，尚无书名可言。李式与王羲之叔父王廙的年龄相当，二人都是东晋初年书坛上的重要人物。在王羲之眼里，李式的书法“是平南之流，可比庾翼。”^{②④}平南即王廙，是东晋初年书坛的权威，王羲之学书曾得到他的传授。庾翼的书法，年轻时声望在王羲之之上。^{②⑤}王廙与庾翼是旧而不新的书家，属钟繇一系。在王羲之眼中，李式的书法水平，可以说不让庾翼与王廙。梁朝庾肩吾《书品》中将三人同列“上下品”。王羲之生前品评书法的言论极少，所提及的书法人物，不外乎张芝、钟繇、王洽、王献之、庾翼、王濛数人，不是前朝的权威就是当代的重镇。李式被王羲之评为其叔父一流，地位可想而知了。李式在东晋初年便谢世了，但南朝以至唐朝的书法典籍如《采古来能书人名》（羊欣）、《文字志》（王愔）、《论书》（王僧虔）、《书品》（庾肩吾）、《书断》（张怀瓘）都有著录或品评，可惜他的书迹在唐朝时就已经失传了。

李式从弟李充也是精通书艺的名家。《晋书·李充传》记其一生行状不过数事，书法即其一端。曰：“善楷书，妙参钟索，世咸重之。”李充幼时丧父，由母亲抚育成人。母家安邑卫氏是

汉晋时期四世善书的显族，母亲卫夫人是一位“善钟法”、“规矩钟公”的著名书家，李充学书当由卫夫人亲授，这是李充书法“妙参钟索”的重要背景。卫夫人又是东晋新书风的开创者王羲之的启蒙之师，^②因而李、王二人在书法师承方面有同门之谊。李充交游的人物，都是当世的名流，《晋书·王羲之传》记载：“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这些聚居于浙东的冠世名流，都属于谦退恬淡之士，拔俗于士林，有服食的雅好，不是长于文学就是工于书法，文化趣味投合。

从江夏李氏两位精通书艺为世人所重的代表人物来看，书法宗尚钟繇一系，他们的声望在东晋之初能够与琅邪王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等量其观。由于梁武帝特别是唐太宗推崇王羲之，李氏家族的书家才渐渐失去昔日的光泽，这也是魏晋时期许多著名的书法家所共有的命运。但江夏李氏毕竟在东晋书坛上占据过重要的地位。唐朝时李邕以行书饮誉海内，联系家族门户渊远的文化背景，可以说是克绍箕裘。

四、余 论

前面说到，李氏在江夏立足成为望族，能于汉末李通时聚众拥兵成为地方势力，与分房所自的颍川襄城李氏的宗族势力和社会声望有关。这里还要补充的是，两地的李氏家族在东汉末年袁绍曹操争雄之际，政治上都倾向曹操。《后汉书·李膺传》记载：“膺子瓚，位至东平相。初，曹操微时，瓚异其才，将没，谓子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邈）与吾善，袁本初（绍）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诸子从之，并免于乱世。”张邈、袁绍、曹操三人年轻时皆以游侠知名于世，结为友好。天下大乱之后，张、袁二人与曹操反目，都败在曹操手下。李瓚在曹操得势之前就预见到曹操可以依归，颇具卓

识，而目的在于保全家室。江夏李通率众投奔曹操在建安初年。官渡之战前夕，李通孤军驻屯袁绍本籍的汝南郡，任阳安都尉，整个局势对曹操极其不利，《三国志·李通传》载，当时袁绍“遣使拜通征南将军，刘表亦阴招之，通皆拒焉。通亲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独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从绍。’通按剑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绍虽强盛，而任使无方，终为之虏耳。吾以死不贰。’即斩绍使，送印绶诣太祖。又击郡贼瞿恭、江宫、沈成等，皆破残其众，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李通最后为曹操效死沙场，的确实践了“以死不贰”的誓言。我们知道，曹操在割据争战之际，引用的人才许多是颍川、汝南二郡及荆州人士，^②李瓚的“必归曹氏”之论，恐怕是颍川世家大族、名士的共识。而江夏李通认定“曹公明哲，必定天下”，固然与他的亲身体验有关，恐怕也与颍川人士的影响大有关系。

江夏李氏门户的盛期在魏晋之世。论仕宦，李通，李秉，李重、李矩，李式，四世守郡。论名望，李重为中夏名士，李充为中兴名士。论婚姻，则与安邑卫氏缔姻。论学术文艺，李式、李充是东晋冠冕。论高逸儒隐，李颙负平素之誉。论门户悠远，即使不把分房所自的颍川襄城李氏的家族背景加以考虑，也应当算作东汉时期建立门户的旧族。但李氏在社会舞台上活动的高峰期是在门阀政治的东晋，因此梁朝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所征引的《李氏谱》及《文字志》、《中兴书》、《晋百官名》、《晋诸公赞》等典籍，所记江夏李氏人物，最晚者只记到李志一辈。

《晋书》所记，晚者乃李颙，与李志同辈。以李就为江夏李氏一世祖的话，李志、李颙为十世，时限在东晋末叶。唐朝晚期，门户中先后有李鄘于宪宗元和十二年至十三年（817—818）、李磎于昭宗乾宁元年至二年（894—895）为宰臣，但是两人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作为，不过是结束这一门户七百余年历史的回光返照。

注:

①《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应劭注。

②李氏居江夏，具体地点有二说。《世说新语》品藻第九“谢公与时贤”条注引《晋诸公赞》称李重为“江夏钟武人。”《晋书·李重传》亦称“江夏钟武”，《世说新语》品藻第九“庾道季”条注引《晋百官名》称李重孙李志“江夏钟武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江夏李氏一世祖李就“徙居江夏平春”。估计李氏居住地西汉时属钟武，东汉时属平春，县名虽异而住地并未迁徙。

③李就所出，《宰相世系表》两处有记载。“赵郡李氏”条曰：“武字昭先，东郡太守，太常卿，生赞、脩、弈、就。”李就当为李武幼子。“江夏李氏”条曰：“昭少子就，后汉会稽太守……。”是为李昭少子。疑李武字昭先，后人误以为李昭之后而系自李昭所出。考虑到《宰相世系表》中“江夏李氏”条所记世系多有颠到错讹，此取李武幼子之说。

④《三国志》卷一八李通传记载李通救援曹仁于江陵，“下马拔鹿角入围，且战且前，以迎仁军，勇冠诸将。通道得病薨，时年四十二。”事在建安二十四年（219）秋，则李通生当灵帝光和元年（178）。

⑤见《三国志》卷一八李通传。

⑥《三国志》卷一八李通传注引王隐《晋书》，《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李平阳”条注引《永嘉流人名》、《晋书》卷四六李重传俱有记载。

⑦见《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李平阳”条。

⑧参见《三国志》卷一八李通传裴注。

⑨李尚、李矩见《李通传》裴注。李矩又见《晋书》卷九二李充传。

⑩《世说新语》棲逸十八注引《文字志》，《晋书》卷九二李充传附记俱见。按：《晋书·李重传》称李式“咸和初卒”，张怀瓘《书断》下云：“咸熙三年卒，年五十四”。东晋无咸熙年号，当是咸和之误。又诸书皆称其卒年五十四，当无争议。推其生年，应在晋武帝咸宁元年（275）。

⑪见《法书要录》卷一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

⑫见《世说新语》品藻第九“庾道季”条注引《李氏谱》。

⑬《世说新语》棲逸第十八“李廌”条称“李廌是茂曾（李重表字）第五子。”注引《文字志》曰：“廌尝为二府辟，故号李公府也。式字景则，廌长兄也。”按：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称李廌为李式之子，误。

⑭《晋书·穆帝纪》：永和二年（346）七月“褚裒为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永和五年二月褚裒北伐，七月失败，十二月褚氏卒。李充

为征北府参军，当在褚裒开府未久。其苦求外出，褚裒“许之以县”，必在北伐军兴的永和五年二月以前才有暇办理。据《晋书》记载，李充是在剡县任上“遭母忧”，而由征北军府所在的京口赴浙东途中尚须时日，因此，把李充出任剡县的时间定在永和四年（348）较为允当。

⑮《世说新语》品藻第九“庾道季”条注引《晋百官志》。

⑯《庄子·徐无鬼》载：黄帝曾于襄城之野向牧马童子请教为天下之道，《元和郡县志》卷六汝州“襄城县”条称，周襄王尝出居此地，故名襄城。

⑰敦煌写本《姓望氏族谱残卷》（斯五八六一，伯三一九一）：“颍川郡八姓：陈韩钟荀于许庠鳞”，《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斯二〇五二）：颍川郡出十一姓：陈荀庠庠钟栢许韩豆卢鲜于焉”，皆不列居襄城的李氏。

⑱见《宰相世系表》。

⑲见《宰相世系表》。

⑳《初学记》卷一八引李充诗句。

㉑《太平御览》卷五九七引李充《起居诫》。

㉒《晋书·李充传》录有《学箴》全文，《全晋文》所辑诗章，估计都是《李充集》中收录的篇章。

㉓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江夏李式，晋侍中，善草隶。弟定，子（当为弟）公府，能名同式。”唐张怀瓘《书断》下：“李式字景则，江夏钟武人，官至侍中。卫夫人之犹子也，甚推其叔母善书。”《晋书》卷九二李充传附记：“充从兄式以平稳著称，善楷书。”《世说新语》棲逸第十八注引《文字志》：“厥好学，善草隶，与兄式齐名。”

㉔见南朝齐王僧虔《论书》。

㉕《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

㉖见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唐张怀瓘《书断》中。

㉗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一文。

作者工作单位：中央美术学院书法艺术研究室

（本文责任编辑：袁俐）